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15520151152669

分类号	密级	

UDC ____

度门大了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反腐败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 一个准自然实验

Anti-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胡小丽

指导教师(校内): 丁锦秀 助理教授

指导教师(校外): 李刚为

专业名称:税务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 2017年 11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7 年 11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7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7年11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本人声明该学位论文不存在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 承担因学术不端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名):

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摘要

反腐倡廉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和腐败日益严重的当下中国,这一"双高之谜"引起了国 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的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腐败对企业生产效 率、投融资状况、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对于腐败与企业避税行为方面的 研究还比较少,其间的作用机制更是尚待厘清。

本文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败行动作为外生冲击,以 G 省 2012—2013 年度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观测企业业务招待费支出及其占营业收入比重在反腐新政前后的变化水平来识别企业的腐败程度。为了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 DID 模型,检验了反腐新政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反腐新政实施后,相对对照组企业,高腐败水平的企业避税程度增加;(2)反腐新政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仅在国税征管和私营企业中显著。(3)作用渠道分析表明,在征管强度提升的前提下,反腐败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预缴率、加重企业整体税费负担这些渠道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腐败经济学在税收领域的认知,并为今后业务招待费支出的管理、降低企业避税行为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反腐败 企业避税 所得税预缴率 税费负担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anti-corrup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 growth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China with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but increasing serious corruption, this "double high mystery"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of domestic scholars. Using micro level enterprise data,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focus on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on the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few research has been fou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moreover, the mechanism is still needed to be clarified.

Taking the anti-corruption actions raised by the China's 18th Party Congress as an exogenous policy impact event, this paper uses the national corporate tax survey data of G province from 2012-2013 to identify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level by observing the changes of business entertainment expenses and its proportion on business income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anti-corruption policy.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e paper appli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anti-corruption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fter the China's 18th Party Congres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ose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corruption incidence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ax avoidance. And the results further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more pronounced if the taxation authority is a national one or the enterprise is private.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shows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increase i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the anti-corruption will influence th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through raising the prepayment rat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increasing the overall tax and fee burden. This paper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in the field of taxation, and provides a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business entertainment expenses and th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Prepayment rate of income tax; Overall tax and fee burden



目录

第	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研究方法	3
	1.3	研究框架	3
第	2 章	文献综述	5
	2.1	腐败影响微观企业发展的研究	5
	2.2	企业避税方面的研究	6
	2.3	腐败影响企业避税的研究	8
	2.4	现有研究评述	9
第	3 章	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11
	3.1	研究假设	11
	3.2	研究设计	15
		3.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5
		3.2.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6
第	4 章	实证结果及检验	21
	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1
	4.2	实证结果分析	22
		4.2.1 基准回归	22
		4.2.2 异质性检验	24
	4.3	作用渠道分析	27
	4.4	稳健性检验	29
		4.4.1 替换企业避税程度指标	29
		4.4.2 重新构建腐败指标	30
		4.4.3 排除其他政策因素	32
		4.4.4 安慰剂检验	33

5.1 研究结论	3 3
5.3 贡献与不足参考文献	3
参考文献	3
	7///
致谢	4
致谢	4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1.1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1.2 Research method	3
1.3 Research framework	3
Chapter 2 Literature review	5
2.1 Literature review on corruption	5
2.2 Literature review on tax avoidance	6
2.3 Literature review on corruption and tax avoidance	8
2.4 Comment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9
Chapter 3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empirical model	11
3.1 Research hypothesis	11
3.2 Research design	
3.2.1 Sample selection and data sources	15
3.2.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model setup	16
Chapter 4 Empirical results and tests	21
4.1 Summary statistics	21
4.2 Discussions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22
4.2.1 Anti-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22
4.2.2 Heterogeneity test	24
4.3 Mechanism Analysis	27
4.4 Robustness tests	29
4.4.1 Replac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29
4.4.2 Redefining the corruption index	30
4.4.3 Excluding other policy factors	32
4.4.4 Placebo test	33
Chanter 5 Conclusion and enlightenment	35

5.1 Conclusion	
5.3 Contribution and deficiency	36
Reference	38
Acknowledgement	42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2012年底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登上治国理政的舞台,中央政治局旋即出台了八项规定,这一举措拉开了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的序幕,随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规定,如六项禁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在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重锤下,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2014年年度工作报告显示: 2013年全年全国共立案侦查官员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871人,其中厅局级253人、省部级8人,无论是立案数、查处数还是涉案官员的层级同比均呈现出显著上升态势,证实了国家层面反腐败力度确实加大了,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行动得到了国际国内的认可,根据透明国际对于全球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报告^①,样本观察期间(2012—2013年)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数同比略有提高。

G 省作为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前沿之地,其官员面临的诱惑不可谓不大,反腐败行动开展以来,G 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败工作硕果累累。根据 G 省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4 年年度工作报告内容,2013 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 2347 人,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 726 人,坚决查办大案要案,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 170 人,厅级干部 32 人,厅级干部查处数同比上升 68.4%,同时关注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案件,查办村官 299 人,同比上升 23.5%。2013 年 G 省官员职务犯罪人数占全国范围内职务犯罪人数的 6%,占比之高足以说明地区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

^①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 1995 年起每年发布《全球腐败年度报告》,它主要是利用国际上重要的、著名的调查报告来测度业界和民众对于各国的腐败程度的观感。

反腐力度的加强,有助于重塑党执政为民的朴素观念,提升政府公信力, 然而, 腐败对于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 学术界至今仍未得出一 致结论。"有效腐败论"的支持者认为腐败是政府低效机制的润滑剂,企业通过 寻租行为调整管制和无效政府决策对于企业的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Leff, 1964; Lui, 1985; 李捷瑜和黄宇丰, 2010), 但更多的 学者研究指出腐败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效率和企业投资(Cai et. al, 2011; 申宇和赵静梅,2016),并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不利影响(Murphy,1993), 反腐新政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钟覃琳等,2016)、改善公司治理、强化高管激 励机制并提高企业会计质量(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在腐 败经济学中已经做了有益尝试,但现有文献在反腐败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方 面还鲜有涉及,主要是面临着以下几个挑战:一是腐败是一个较难衡量的变量, 现有研究一部分通过感知度问卷调查数据[®]衡量腐败(01ken, 2007; Song 和 Cheng, 2011), 但有学者指出由于腐败的隐秘性, 采集的数据可能存在某种偏 向性 (Bertrand 和 Mullainathan, 2001); 通过腐败立案数和处分数衡量腐败 程度(周黎安和陶婧, 2009: 陈刚和李树, 2010)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立 案数和处分数衡量的是反腐败力度而非腐败程度(倪星和孙宗锋,2015)。二是 难以得到高质量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用于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多基于公开的 上市公司数据或者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而这些数据存在天然的局限性,比如 数据中反应企业税收方面信息的直接指标较少,许多税收数据需要通过中间变 量换算,从而导致数据误差范围大。三是腐败与微观企业主体行为之间有着很 强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在因果关系识别上存在一定困难。

再者,企业逃避税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会影响二次收入分配,在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放缓,公共支出需求不断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凸显的大环境下,稳定的税收收入对于政府的意义不言自明,而企业的逃避税行为无疑将会进一步激化财政收支矛盾,因此,如何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对于应对当前政

的一个腐败指数等。

^②常见的感知度调查有: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和行贿感知指数(Bribery Perception Index),国际商务组织(Business International)、《国际风险指南年报》(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政治风险服务公司(Political Risk Services Inc.)每年分别公布的反映各国腐败程度的指数;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包括

府财政收支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吕炜和陈海宇(2017)使用 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腐败立案数度量地区腐败程度,并以企业报告利润与推算利润的差值来表征企业的逃避税程度,初步探索了腐败和企业逃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腐败程度会增加企业的逃避税行为的边际收益,从而降低企业纳税遵从度。那么 2012年以来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反腐行动对于微观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是否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潜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尚待回答。于是本文将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的反腐新政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事件,从 G 省 2012—2013 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中提取与研究相关的各项指标,通过观测反腐败前后企业业务招待费及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重这两者在反腐新政前后的变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企业的腐败程度,并采用 DID 模型有效地规避了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反腐败给微观企业避税行为带来的影响,并尝试探索了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1.2 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外文献,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以G省2012—2013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作为实证环节的研究样本,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方法考察反腐新政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效应,检验这种影响在分组样本中是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反腐新政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潜在作用渠道。

1.3 研究框架

本文共有五个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引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概括叙述反腐败、企业避税行为方面的文献研究,确定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结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涉及反腐败、企业避税方面的文献进行详细梳理, 并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述,厘清企业避税与纳税遵从度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为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结合企业现实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实证模型部分具体介绍了: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模型设定

与变量定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包括对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程度)、主要解释变量(腐败水平)和控制变量(企业绩效、负债水平、净现金流、固定资产密集度、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的数据分析。

第四章为实证结果及检验,报告基本回归、异质性检验、作用机制等部分的结果,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章是研究结论,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做出总结,提出文章研究对遏制 腐败、降低企业避税行为方面的有益启示,同时指出本文的贡献与不足。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腐败影响微观企业发展的研究

腐败与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腐败到底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一致结论,宏观经济表现是微观企业运行的结果,在腐败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这一问题上也相应地存在促进和妨碍两种观点。

认为腐败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已有文献可大致梳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指出 企业贿赂对企业发展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概括而言是指当企业处于官僚作 风盛行、政府过度管制的环境时,贿赂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政府出台的低效政策 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助力企业顺利发展(Leff, 1964; Huntington, 1968)。 Lui (1985) 构建"排队模型",结论表明适度腐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 企业提高效率,企业通过贿赂可以激励政府工作人员主动缩短审批程序,提供 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运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在全 球范围内经济转型国家的 BEEPS 调查数据(该调查持续了两年,2004—2005年), 研究发现转型经济中贿赂与企业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在非转型经 济中则得到相反结论,进一步研究指出企业的贿赂行为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绕 开行政管制,获得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官员的掠夺,证实了贿赂是企 业发展的"关系资本"这一观点。于蔚等(2012)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指出民营上市公司在面临融资约束时,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更容易获取 银行贷款。申宇和赵静梅(2016)也得出企业吃喝腐败费用每提高1%,可以带 来企业债务融资增加 2.91%的结论。Mironov (2015) 利用莫斯科居民个人交通 违规记录数据与 58157 个私营企业管理层人员数据进行匹配, 研究表明与非腐 败类企业相比,腐败盛行的企业其管理层人员交通违规记录每上升 1%,企业业 绩提升 3.6%。第二类研究指出企业贿赂支出类似于保护费, 使企业实现某种豁 免,比如 Cai 等(2011)研究指出在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情况下,用贿赂方式 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负。

然而, 更多的学者认为腐败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如 Murphy (1993) 认为腐败的不确定性和隐秘性会给企业带来高额的交易成本,还会损害企业的 研发创新活动。Wu(2005)认为企业大股东和管理层基于自利动机进行寻租, 会给企业带来某种程度的风险,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Cai 等(2011)针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腐败程度越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低,而且这 种影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即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效应明显 高于发达地区企业; Mironov (2015) 不无担忧地指出,在贪腐横行的企业,越 贪腐的人进入企业管理层的可能性或者意愿相对更高, 长此以往企业管理层将 被腐败攻陷,人员选拔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必然对公司治理提出 更大的挑战。申宇和赵静梅(2016)利用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招待费和差旅 费为"吃喝腐败"的代理变量,发现"吃喝腐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扭曲了资源配置效应,具体地,对于投资不足的公司,吃喝费用每提高 1%,投 资不足程度增加 5.89—9.76%, 对于过度投资的公司, 吃喝费用每提高 1%, 投 资效率降低 12.29—15.10%。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以世界银行 2006 年报告 的招待费和旅游支出数据作为划分高腐败地区和低腐败地区的依据,利用倍差 法考察了十八大之后反腐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高管激励和股东价值 的影响,发现反腐新政后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现金持有价值、高管薪酬业绩 敏感性、会计质量方面相对于低腐败地区上市公司有明显提高,最终得出结论: 反腐新政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强化高管激励机制,同时提升会计质量,并最 终增进股东价值。钟覃琳等(2016)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相 对于腐败水平较低的企业,反腐败使高腐败水平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 回报率分别提高了 0.6%、1.87%, 即反腐败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并且指出这种 关系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区域更加明显,从而反证了腐败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 负面影响。

2.2 企业避税方面的研究

对于逃避税方面的研究最先始于国外学者的理论模型构建,Allingham 和 S-andmo(1972)最先建立了个人所得税逃税的经典模型(被称为"A—S"模型),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纳税遵从问题,理论研究指出:处罚力度与稽查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